

经济学与 经济政策

〔英〕阿列克·凯恩克劳斯 著

商务印书馆

547830



2 016 6628 7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

〔英〕阿列克·凯恩克劳斯 著

李 琮 译



商务印书馆

1990·北京

01180/12

Alec Cairncross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Basil Blackwell Ltd 1986

根据巴兹尔·布莱克韦尔出版公司 1986 年版译出

JINGJIXUE YU JINGJIZHENGCE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

〔英〕阿列克·凯恩克劳克斯 著

李 琮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834-4/F·88

1990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92 千

印数 1-4,000 册

印张 8 2/8

定价：2.95 元

译者前言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一书，是当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列克·凯恩克劳斯新近出版的重要著作。

阿列克·凯恩克劳斯爵士，1946—1949年曾任英国贸易委员会经济顾问，1949—1950年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顾问，1964—1969年任英国政府经济咨询服务委员会主席。以后从事教育工作和学术活动。曾任牛津圣彼得学院院长，现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他著作颇多，其中包括《经济学导论》（1944年出版，现已出至第6版）、《经济管理论文集》（1971年）、《恢复年代》（1985年）等。他曾于1979年率领英国学术代表团访华。此后，他又多次应邀来我国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包括1985年的“巴山轮讨论会”，对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提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议，对促进英中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作出了贡献。

本书是一本演讲集，共收录了作者近些年来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演讲13篇。这些演讲涉及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中广泛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包括如何看待经济学理论，如何把理论应用于经济政策的制订，如何发挥经济学家的作用，如何使经济学家与实际工作者相结合，对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二者短长的分析，如何使二者相配合，对凯恩斯主义的评介，计划工作应遵循的原则，如何在变化不定的条件下进行计划工作和进行决策，影子价格的作用，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技术和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各起什么作用，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评价，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比较，对作为政策手段的汇率的分析，就业政策的历史演变和如何对

付失业问题等等。这些既是西方经济学所讨论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西方国家制订经济政策所要考虑的重要实际问题。由此可知，本书的特点在于，它既不是经济学的纯理论论述，也不是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客观介绍，而是作者根据自己多年从事英国政府经济政策咨询工作的丰富经验和切身体会，对各种问题提出的观点和作出的结论。虽然作者主要联系英国的实际，但也反映了他对西方国家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的一般看法。

目前我国正在深入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我们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把计划和市场机制适当结合起来，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宏观加强控制，微观搞活。在这些方面，西方的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进行研究的。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我们特将此书译出，并请作者为中译本作序。相信广大科研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会从中吸取到一些有益的东西。当然，这种吸取，应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采取分析态度，并充分考虑到我国实际情况，而不是机械地照搬。

由于本书系作者在英国的演讲集，其原来对象当然不是中国读者。因此，对中国读者来说，书中某些章节和段落可能感到生疏，但本书各篇演讲的基本内容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中文版序

我希望中国读者对本书中的文章感兴趣。这些文章本来是为西方的不同听众而写的。他们比较熟悉西方近些年来遇到的各种经济问题，也比较熟悉为对付这些问题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手段。然而，中国经济的许多问题，虽然其表现形式和解决办法不一样，但从根本上说，与其他国家的问题是相同的。

本书所涉及的问题分四类。头两篇文章讨论经济学家在经济政策的制订中的作用；其后四篇论及经济计划的各个不同方面；再后三篇是有关经济发展和增长问题的；最后四篇阐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手段。虽然对本书读者来说，显然要求他们事先具备某些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但我希望，即使是并不内行的人也能看出文章论述的标准，从而感到每篇文章的要点是明白易懂的。

假如我是个中国读者，我就宁愿先把前两章放在最后去读，而从第三章开始，这一章是讨论人们所熟悉的关于国家的作用与支配市场的经济力量的关系问题。近十年来，全世界人们的意见都倾向于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而减少国家控制。但是，在这种舆论的转变中有一种风尚的因素，人们必须要问根据什么要在这二者之间保持一种令人满意的平衡。这个问题在下一篇文章中进行了讨论，那里说明了凯恩斯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在这之后讨论了人们在组织经济活动的事务中的无知和不确定性带来的后果。文章认为，不确定性越大，也就越需要吸收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即使代表会使计划工作和协调更加困难。这一组文章的第四篇考察了一种可能的方式，即让市场力量自由运行，而通过影子价格保持某种形式的

中央控制。所谓影子价格,即反映对社会价值的判断的价格,它不同于市场价格,是在政府进行决策时使用的(例如,在评价公共投资项目时)。

第七章到第九章的第三组文章论述了决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力量。这些文章特别强调了创新,或者如中国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现代化。当市场在扩大和必要的资金易于获得时,创新就进行得更快。它也取决于对改进的机会能否自由地作出反应,以及生产者对这些机会的警觉。但是,经济发展并不是一种纯经济现象。它也取决于人们的态度和反应。人们对变革和创新会有抵制,或者相反,公众会渴望推进现代化,并全心全意地支持它。

最后四章中国读者可能感到吃力些,因为它们讨论的是更加专门的西方的观点和问题。但是,在中国现在也有如何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结合的问题,也有如何调节汇率以及如何保证充分就业或近似充分就业的问题。中国越是更多地依靠财政手段进行控制,而不是更多地依靠行政调节,就更加迫切地需要了解这些手段如何使用,它们有怎样的潜力和怎样的局限。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希望中国读者会真正地喜欢读这本书。如果我能期待这一点,它将使作为作者的我感到无比高兴。

阿列克·凯恩克劳斯

序

本书所包括的文章是过去十多年中对英国或国外的听众偶然所作的讲稿，或是为纪念文集或类似的专题文集所写的文稿。这些文章不是作为对当代各种问题的评论，而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经济政策持久争论的问题的概括的看法。

所涉及的问题归为四个题目。头两篇文章讨论致力于经济政策研究的经济学家的作用；接着的四篇文章是论述制定经济计划的各方面问题，三篇是论述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本书最后四篇文章是论述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手段。这些文章显然适合于那些已经熟悉基本经济学的人，但我希望，甚至一般的读者也会发现其论述的标准从而感到每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明白易懂的。

有三篇文章，即《不确定条件下的计划工作与决策》、《有没有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就业政策的浮沉》，过去从未发表过。其他文章，有些是难于看到的，有些是分散发表于各类刊物上的。

我感谢麦逊公司同意将原载于《经济政策概念的变化》一书中的《学者和决策者》一文纳入本书；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同意将《市场与国家》一文修改后从同名书中转入本书；感谢麦克米伦出版社同意将原载于《凯恩斯与自由主义》中的《凯恩斯与计划经济》一文，以及原载于《就业，收入分配和发展战略》一书中的《影子比率的限度》一文纳入本书；感谢里兹大学出版社同意将原载于《通货膨胀，发展与一体化》中的《对革新的看法》一文修改后纳入本书；感谢联合私人出版有限公司同意将原载于《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的看法》一书中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一文

纳入本书。我也要感谢美国经济协会同意重印我的理查德·伊利讲稿《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其余三篇文章是奥本大学、英国学术院和《三家银行评论》同意发表的。

我在准备这些文章的过程中，思想上受到的恩惠太多，不能在此一一列举。然而，我必须向伊利·德文斯表示我的感激之情，即使他在我的这些文章写就之前 20 年已经逝世了。我在技术和技术变革方面的思想很多应归功于迈克尔·福雷斯的帮助。我还要感谢几年前我从财政研究院主办而由我主持的有关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关系的多次会议中受到的教益。最后，我应感谢沃尔特和迈克尔·萨伦特以及托马斯·威尔逊教授对《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的草稿所提出的很有帮助的意见。

我还感谢安妮·鲁宾逊夫人把我模糊难以辨认的文字变为清晰而漂亮的打字稿。

阿列克·凯恩克劳斯

目 录

中文版序	1
序	3
一、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	1
二、学者和决策者	24
三、市场与国家	42
四、凯恩斯与计划经济	65
五、不确定条件下的计划工作与决策	88
六、影子比率的限度	108
七、创新、模仿和增长	121
八、技术和自然资源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139
九、有没有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	152
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	168
十一、作为政策手段的英镑汇率	188
十二、就业政策的浮沉	215
十三、就业政策是已经过去的事了吗?	231

一、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

我的孩子，你不知道管理这个世界的智慧
是多么少吗？

——奥克森斯蒂娜

让我们正视这个世界！不管经济学过去怎么样，它现在实际上是一种行业。它包括理论家们创立的新模式到实践家们提出的意见、预测、建议和计划，它主要是适应企业和政府的决策者的市场需要。在经济学行业里，特别是它的理论，市场力量的作用是微弱的。竞争过程从价格的调整中得不到多少利益，而供货者往往远离市场，不感到市场的压力。但是，通常增长和发展的现象总是不断出现的，如投资、规模经济，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大的相互影响。我们的同行中有些人把他们的活动只限于生产，而另外一些人则从事于包装和销售业务。劳动分工在水平和垂直两方面都已有了迅速的进步。一方面我们有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专家：宏观经济学、工业经济学、运输经济学、保健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等等。另一方面在那些置身于理论云端中的传教士式的人和那些在华盛顿、白厅等地奋斗于仕途的世俗者之间有一大批中间层次的人。那里有很多工作者，他们的成就值得深入研究，可作为经济学的又一支。

今天，我不想承担解说各种经济学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一生有一半时间是连续在政府部门和国际机构工作，我想最好让

本文系提交给达拉斯美国经济协会年会理查德·T. 伊利讲座的讲稿。

自己做件较为适当的事,为经济建议的需要,我作为中间层次的人来谈谈我自己的经验。我想只限于考察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也就是在那些以自己的模式探索掌握经济的内在秘密的理论家和那些置身于时间珍贵、认识有限、情况变化不定、非经济考虑常起重要作用而有决定性作用的活动中的实践家之间的联系。

活动可以有两种方式。或者只不过是政策的介绍,或者也包括采取决策。谈到实践家,一般我想的是那些考虑应采取什么政策的人,他们或者是职业经济学家,或者是非职业的,而不是那些最后的决策者。但是,有时我感到不能不注意决策者在利用经济建议时的困难,而无须注意他的经济顾问们制订这些建议的困难。

看看各个地方,理论与实践往往相离甚远。在许多国家甚至在机构上是分离的:理论家呆在他们的大学里,实践家在他们政府的各个部门,二者之间很少接触。而既然思想最自由的传播是通过个人的接触,机构上的分隔就带来思想的分离。政策顾问们的思想许多都同学术研究人员的思想相隔离。甚至在有些国家大学和政府之间虽有一些交流,某一类的经济学家同另一类的经济学家也有一些交往,但各方都有要按自己的常规行事的强烈倾向,内部奉行的思想方针,不考虑外界的意见,反之亦然。

既然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很不一样,它们之间存在某些分歧就并不奇怪了。例如,在医学、工程学或人类其他的活动中,根据个人对理论或实践的兴趣,或者会问“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或者问“我该怎么做?”一个在商业公司或政府部门工作的经济学家,除非他对研究部门完全隔膜,他感到在他所处的环境中实际行动比理性思考更重要。对实践家来说,待解决的问题往往是“该怎么做?”那是纯理论家可能拒绝回答的问题,因为他感到没有特别的能力这样做。他可能赞同纳索·西尼尔的看法:“不管经济学家的结论的普遍性和正确性如何,不允许他加进任何建议的片言只

语”。^①但是这不是一个可以回避的问题，而且经过经济学方面的学习可能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理论能有多大用处？有时老实回答说：“很少”。理论可以解释，但肯定不解决经济政策的有争论的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70年代初英国是否应参加共同市场的争论，学院经济学家有一半人写信签名表示赞同，另一半人写信反对。或者还可指出相信货币政策的人和认为货币政策不可靠的人之间的争论，或者拥护浮动汇率的人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或者支持法定收入政策的人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甚至理论家意见都一致的时候，政策问题仍不能决定。普遍认为，在理论上，支出税比所得税更可取。不过，就我所知，世界各国政府的财政部仍不加改变。没有人急于改行支出税，只有印度和斯里兰卡两个国家采纳过，而几乎马上又放弃试行这种税。

当有人要求我为高级管理人员（他们来华盛顿六个月要尽可能多学习关于他们国家应实施的经济政策）组织一次讲课时，我深切地感受到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他们不想学这种经济学理论，实际上他们也没有时间去钻研理论，他们感兴趣的是对经济思想的实际结果和经济发展的预测。他们问一些十分简单的问题，例如，其中有些人以随便的口吻问：“通货膨胀能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吗？借多少外债才是稳妥的？什么样的税制最有可能有利于经济发展？”我发现，象你们可能预计到的那样，经济学理论对分析他们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很少让人能有信心地得出政策结论。

后来，我又遇到类似的一个小组，他们是来研究投资估计的，而且熟悉了贴现现金流动理论。但是投资估价包含比经济学理论

^① 约翰·朱克斯，《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载《劳埃德银行评论》，第28期（1953年4月），第29页。

更多的东西。我问这个小组的人，他们回去将采用什么样的利率。长时间没有人回答，只有一个人勇敢地说：“银行利息”。没有人反驳他，也没有人提出其他的意见。

在更早的一个时候，1940年我参加英国战时内阁秘书处工作，我曾问我自己，我能将我的经济学理论知识作何用途呢。一个较小的专业经济学家小组对战时政策无疑会有深刻的影响。然而我从未看到经济学理论的较为精练和深奥的部分得到充分利用。我得出的结论，与我的同事，已故的伊利·德文斯所说的一样：“经济学理论是很有用的，既能使我们懂得现实社会，也可帮助我们进行决策，它是简明的、最基本的，从某些方面来说是问题最清楚的判断”。但是，他又谨慎地接着说，在简明的判断成为部分正常思考过程的一部分，并且不再是“单独的所谓‘经济学理论’”之前，^①对问题的熟悉程度需要大大超越基本水平。莱昂内尔·罗宾斯也说过不少大致相同的话，他说：“……当最有用的经济原则以最一般的形式阐述时，这些原则往往看起来不过是些老生常谈，这些原则在争论中形成，又几乎是在难于解决的争论中的一种‘突降法’，然而，经验似乎表明，如果不受系统的训练来应用这些老生常谈，最敏锐的思想也容易误入歧途。”^②

我发现，有那么两三个我原以为对每个人都会是很熟悉的非常基本的经济概念却往往不能完全被非经济学家很好地理解，而这些概念对制定政策具有特别的意义。其中，我认为头等重要的是供应、需求和价格的相互关系，机会成本的概念，以及边际价值理论。后来，我得出结论，能考虑到在经济体系中起作用的市场力

① 伊利·德文斯：《应用经济学——应用什么？》，载于《经济学文集》（伦敦，乔治·艾伦出版社，1961年），第13—14页，第25—26页。

② 阿列克·凯恩克罗斯：《经济管理文集》（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出版社，1971年），第203页。

量,而且能认识到价格机制的协调职能,这甚至是更为重要的。许多其他基本概念,特别是宏观范围的概念都同样十分重要,不过这些例子已足以说明问题。

非经济学家在他们的思想上很少考虑供应和需求对市场价格是如何起作用的,而且不能本能地重视价格机制的功效——也就是它的必要性。相反,他们对经济问题常常倾向于采取组织的和手段。他们喜欢固定价格,因为他们似乎觉得这是加进一种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当有些东西变得稀少的时候,商人和官僚们随即作出的反应几乎总是喜欢采取控制和定量配给的办法,而没有考虑到价格的某些提高可能解除或终止短缺现象。例如,在1947年英国实行工业国有化时期,煤的定价,丝毫没有注意到燃料的长期短缺,以及那种短缺会抑制工业恢复的危险,正象最终发生的那样。外汇价格也几乎同样是脱离市场压力,并且继续被大臣们看作是心理上的或组织上的问题:他们相信,作计划和实行控制能够起到货币贬值所能起的所有作用。

当然,经济学家们可能会犯相反的错误,认为听任市场力量自发地起作用,总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结束时,除美国以外,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国际收支逆差。当时有人认为美元的短缺是政府造成的,是它们决定把本国货币定价过高,从而延长美元短缺。汇率应下降多少,这种下降的结果又会怎样,却很少研究。在战后的头几年,由于正在进行复员和生产大大低于生产能力,进行币值的总调整和随之而来实行价格结构的修改,能大大有助于恢复收支平衡,但这也不是完全不说就明白的,而后来证明这是必要的。相反,也有充分理由采取措施限制进口,鼓励出口,发展可选择的供应来源,约束资本输出,即宁可利用计划,而不利用价格。

同样，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单靠市场力量不易作到必要的人力再分配。通过变动不同部门和机构所支配的资金行事，这在理论上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政府打算着重对市场施加影响，这将因采用直接方法而得到更快更可预计的结果。哪儿要求有大变动，哪儿市场力量的作用就显得缓慢并且有盲目性。

机会成本是非经济学家自然不会想到的另一种概念。很少有人想到“成本”的内在含义，或者习惯地在可选择的基础上决定行动方针。然而，根据我的经验，这个概念对政策分析是不可少的，而且可以广泛地应用。边际成本的概念同样如此，一般人考虑平均值，而不考虑增值，而且常常因此而偏离到错误的方针上去，特别是在涉及定价和确定投资的问题上。

不管怎样，这两种概念都需要细心掌握。边际理论通常告诉人们单一边际，而实际上边际是很多的。没有一个实业家认为产量和价格是他仅有的变量，即使他这样想，也必须考虑它们中任何一个的变动在整个时间序列中的影响。机会成本也有忽略全部可能性的类似危险。卡尔多勋爵最近利用这个概念来证明在严重失业的情况下高成本的煤矿能继续生产。而他的论证方法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只要有大量失业，就不该允许一家公司关闭，也不该允许一个人被解雇，因为有些生产总比没有要好。比较可供选择的方案必须注意全部后果，而不是只注意直接的后果。

当我看到关于影子价格的文章时，我颇有类似的感受，机会成本的概念可能用得太多。与资本、劳力或外汇的机会成本相适应的抽象价格，可以在政府控制下在有限的经济部门实施；但是，那将导致受控制部门和非控制部门之间关系失常，从而阻挠政府意图的实现。此外，远远脱离市场价格的影子价格甚至在被控制的部门里实施也是很不容易的。下属机构在决定他们的投资计划时往往不大注意影子贴现率，而是根据他们必须支付的借款利率来

定投资总额,这些借款会由于中央政府的任何一些补贴而减少。要使一种影子贴现率在国营部门生效,中央政府用没有以影子贴现率提供的资本所支持的命令未必有多大成效。

经济学家最大的优点是他们的思想方法。考虑可供选择的方案,在一种经济体系的合乎逻辑的结构内探索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的内容,这对他们来说是当然的事。他们注意到在那种体系内的各种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他们也很注意决策的全面的经济影响。象首相艾德礼一样,他们不难懂得,在国内经济如此活跃时,国际收支方面就会有这么大的麻烦。象拉德克利夫勋爵(也许是他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律师)那样,他们不需要让人说服,对货币体系作用的调查就包括对资本市场作用的研究(然而,我必须承认,有一些专业经济学家甚至现在似乎还同意拉德克利夫勋爵的观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中央经济计划的争论中突出地说明了一个恰当的思想结构的重要。行政官员和政治家在热心制定计划时都往往忽略价格机制的作用。当代最杰出的人物中的两位,奥利弗·弗兰克斯爵士和斯泰福·克里普斯爵士(一位是高级行政官员,后任驻华盛顿大使,另一位是著名的工党财政大臣)发表了中央计划问题的说明,没有一点谈到经常有一些强大的力量在消除供需差额中起作用,也没有提到这些力量很值得注意。^①除非学过经济学的,几乎没有行政官员或政治家认为必须完全依赖政府计划或依赖价格机制,而且真正的问题常在于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

象在战时那样,价格机制可能只起很小部分的作用,因为政府

^① 奥利弗·弗兰克斯爵士,《战时和平时期的中央计划和管理》(伦敦,伦敦经济学院,1947年);斯泰福·克里普斯爵士的评注载于《1947年经济评论》,未署名(7048号指令)。